

开创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格局

To Set Up the Low Birth Patter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穆光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副教授 北京 100872)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实质是 “生育机制”和“工作机制”的转变问题

当前“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包含着对过去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生育率转变机制的反思。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稳定”?至少是因为目前所观察到的低生育率还不够稳定,何况生育水平是关系中国未来人口增长前景和问题演变趋势非常重要的一个变数,所以不稳定是不行的。

“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么一种提法,表面上看似只是一个“生育水平”的高低问题、是一个数量问题,其实是一个“生育机制”和“工作机制”的转变问题,而如何转变,实际上又是如何认识人口规律、如何调整利益格局的问题。这里的“生育机制”主要指生育决策的过程,譬如,能不能实现从家本位生育决策向个人本位生育决策的过渡就很要紧;而“工作机制”是指做好生育控制、生育服务工作的具体思路和运作方法。“稳定低生育水平”实际上是促进人口现代化的需要,是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需要,是计划生育“两个转变”的需要。

90年代中期,我们几位中青年学者自发组织了“中国低生育率后果及其对策”的前瞻性研究,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报告,^[1]当时笔者就提出了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我国低生育率格局3个基本的特点: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彻底性。^[2]从区域格局的角度看,“稳定低生育率”主要是针对后进地区来说。正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低生育率只是一个总体格局,背后还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别。后进地区生育率的下降具有比较浓郁、比较强烈的超经济、超文化的特点。这样,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面向21世纪的计划生育工作战略就需要作出这样新的部署,即“先进地区带动后进地区”、“东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城市辐射乡村”。这3种努力的整合也许可以理解为新时期的“西进”战略和“东进”战略的结合,如湖南已经提出了要向东部发达地区工作看齐的口号。毫无疑问,新世纪对生育的社会控制

必须摒弃各自为战的旧思路,而是要强调彼此的合作,共同为全国的、稳定的低生育率格局的形成作出贡献。

但笔者想提醒一点,“稳定”指的是大局和大势,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波动,应当允许西部和东部有一定的差距。承认这种差距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东西部的差异与其说是工作方法的问题,不如说是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别。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当冷静些、再冷静些。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大人口观和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提出已经在警示我们,少生的确并不代表一切。今后要更多关注的也许是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口转变模式和生育率下降机制。急于求成可能会犯“欲速不达”的错误。

在某种意义上,“稳定低生育率”的确比“降低生育率”难度更大。因为稳定低生育率要求的将更多的是工作的质量,而降低生育率只要有一定的工作力度就可以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刚刚出现低生育率态势的时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适时地提出了“抓紧抓好”的口号。我想在今后,这个口号早晚要作出战略性的调整,简单说,就是“抓好”比“抓紧”更重要了,“抓紧”和“抓好”是稳定低生育率的两种基本力量,但“抓紧”需要通过“抓好”来促进和实现。^[3]

稳定低生育格局的实质是要对生育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稳定低生育,更需要在“抓好”上下工夫,同时要在“抓好”和“抓紧”的关系上做文章。低生育时期是全面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质量的时期。

二、重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机制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仅要健全社会制约机制,而且要建立和完善利益激励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最终目的是要促成生育率下降机制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使初步实现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

化最终趋于完成。目前比较缺乏的是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

稳定低生育率的关键在于转换生育率的导向机制。今后在保持社会制约机制作用的同时,需要不断完善和强化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如通过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将计划生育户生育的兴趣转向致富的兴趣。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出利益激励机制,至少包括了“利益补偿”和“利益共享”两个方面,对计划生育户实施养老社会保障和独生子女优待政策实际上就是对计划生育户生育利益损失的一种利益补偿,而计划生育户参与分享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则可以理解为利益共享机制的体现。这恐怕是未来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也是稳定低生育率新的支撑点所在。

稳定低生育这么一种提法实际上已经逼迫我们进入一个利益大调整的时期。现在是计划生育户分享“低生育率社会经济成果”的时候了。稳定低生育,目前还不能放弃社会行政制约机制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着力培育新的、更持久的机制,这就是利益导向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的本质则是利益协调问题。在人口形势上,我们已经从高生育过渡到低生育,今后还将从人口低增长过渡到人口零增长。与此同时,在生育利益上,我们也将对生育主体利益的限制甚至是剥夺过渡到利益的增进、补偿和共享。

综合治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措施,如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二是目标,如生育问题和养老问题的综合治理。到了低生育阶段,更加要求我们具备“大人口”的视野。

那么,该如何强化利益导向和激励的机制?从目前的情况看,值得关注的主要是以下4个方面。

一是生殖健康、生育质量和优质服务,其中包括了“妇女健康”和“优生优育”两方面的内容。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是今后需要不断加强的工作内容。在低生育阶段,服务的要求更多也更高了,所以计划生育的工作重点也要相应发生一些转移。这里需要明确提出计划生育的人道主义关怀。计划生育的历史使命并不就是简单地限制生育,更重要的是优化生育,是保障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的权益。

二是通过宣传教育,建设新的婚育文化(而不仅仅是生育文化)。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就要努力培育生育主体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除了利益上的导向和激励以外,宣传教育、开启民智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计划生育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为创造新的婚育文化作出了贡献。

三是帮助计划生育户脱贫致富。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小额贷款、项目优先、科技扶持、政策优

惠等均行之有效。“三结合”的成功实践证明正确的利益导向和利益激励牵住了计划生育问题的“牛鼻子”,而且较好地体现了计划生育为民服务的宗旨。

四是健全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障。目前农村的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增多,这样养老的后顾之忧也在增多,引入社会保障机制、办养老保险这种做法,等于替农民养了一个“孝子”。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个人,一部分来自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的征收,还有一部分来自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但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标准需要公布,用于什么地方更要清楚。这才是“依法行政”。利益上的激励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和水平,否则就可能没有什么成效。

三、最终目标:实现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低生育时期,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既艰巨又重要的历史性转变是从“以数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我们开创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或者说就是挑战。

归根到底,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的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计划生育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譬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失调就意味着今后将有一部分人口丧失婚姻的权利,这样,我们在现在尽量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保障后代的婚姻权利,最终实现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开创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格局必须明确这样的主题,即将中国人民现在和未来的婚育权利,以及相关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充分保障和公平实现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来认定。

“稳定低生育水平”这种提法从表面去理解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就事论事的误区。其实,在大人口观的指引下不难发现: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重要的与其说是“稳定低生育率”,不如说是解决“与生育率下降有关的问题”或者说就是“在低生育率阶段冒出来的新问题”。最终目标是实现生育现代化和人口现代化。生育现代化要求我们关注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质量、生育方式诸多方面的变革。这些归根结蒂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

现在笔者能够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初步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但由于低生育率的不平衡性、不彻底性和不稳定性,所以还没有真正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从生育水平的角度说,就是从“不稳定”向“稳定”的转变。也就是说,“稳定

低生育水平”的命题要求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低生育性质”的转变,此其一。

其二,可持续发展的低生育格局必然要求突出“以人为本”、杜绝“短期化行为”,逐步放弃“以数为本”的工作模式。这是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自我定位的首要前提。要继续防止和警惕“鞭打快牛”、“少生就是一切”的误区。否则我们的工作目标就可能落空,而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数”的考核了,而是说我们工作的宗旨和灵魂需要明确——不是“人”背后的“数”,而是“数”背后的“人”。

低生育时期是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顺利过渡的好时机。自然过渡加上微调,可能是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上佳策略。^[4]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在宏观上关注,也需要在微观家庭的层面上予以关注。实际上,人口控制的底线就是要尽可能使每一个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社会细胞(家庭)健康,能够维持基本的功能。政策是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的国家力量。一个好的政策必须考虑诸多力量的平衡。

在低生育时期,我们不仅要关注“低生育率”的性质,而且要开始关注“低生育率”的结果。中国生育率急剧的下降不仅带来了良好的后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譬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计划生育户的养老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等。^[5]河北承德、山西翼城等地“二胎加间隔”的实践成效不错,负面影响较少,人口控制较好,干群关系相对融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婚育年龄段,他们的生育何去何从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笔者曾经提出这样的政策主张:只要是独生子女结婚,不管配偶是否独生或者再婚,都可以容许生二胎。目的就是要努力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消除广义独生子女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抓紧”而忽视“抓好”或者以“抓不好”为沉重代价。早在 1994 年,笔者就在“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总结出了紧运行的政策环境所产生的“顾此失彼”和“欲速不达”这两种效果。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正是生育政策顺利过渡的好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笔者认为,在生育现代化和人口现代化而不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框架(有关讨论文章在此不一一列出)的目标体系中,除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以外,恐怕还要加上“改善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保障或增进家庭的生育权益,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这样的提法。这与优质服务、依法行政的提法都是吻合的。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不规则的影响,生育率有所波动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过分强调人口数量问题,可能会重蹈“欲速不达”和“顾此失

彼”的覆辙。要真正实行生育的现代化和人口的现代化,就要在今后用相当的精力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改善妇女生殖健康和增进家庭生育权益。”

人口问题是人类自身的命运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问题。所以,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就是“以人为本”或者说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这是稳定低生育的首要前提。

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根本上是由于判断人口问题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笔者近年强调的观点是:人口问题存在着极其重要的相对性。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以有不同的判断,即人口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管理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也是文化影响问题。但这种不同只是角度的差异而不是本质的不同。

就本质而言,人口问题是相对的和变异的,原发性的人口问题其实是需求问题,而继发性的人口问题其本质则是发展问题。在计划集权的短缺经济和集权政治体制下,中国人口问题就带有很强的体制烙印;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恰当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创新,中国在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总量膨胀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2 亿多下降到现在的数千万左右,显而易见,所谓的人口问题只是更深层问题的面相,而决不是问题的实质。无论是人口过多还是素质偏低等问题都是在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逐渐累积起来的。深一层看,则是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创新问题。这才是诸多中国问题的真正要害。

毋庸讳言,现在学界和实际部门有一种将人口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其实人口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所谓的人口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口变量的变化而引致的人口系统运行的内部失衡现象,以及人口系统和非人口系统——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在互动中的矛盾冲突。这里的人口变量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由此可见,通常对人口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即指生育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是生育的失控问题和生育率的反弹问题;另一种是广义的,包括了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这三大类问题。

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的压力并不是简单地随人口增长而线性相关、同步上升的。^[6]人口增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而不仅仅是挑战的代名词;在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度,我们同样要坚持两点论,即人口既是资源和财富,也是负担和问题。客观而言,人口是生产力和消费力、建设力和破坏力、牵制力和威慑力的统一,是诸多力量形态

的呈现。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惯性增长的阶段,即实现低生育率到实现人口零增长还有长达几十年的惯性滑行阶段,增长的势能尚需较长的时段来释放。在这一时期,尤其需要使中国人口能量的社会经济转化机制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和畅通。譬如,中国上亿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已经在一个大大拓展的就业空间里得到相当程度的转移和能量的释放。

笔者早在 1994 年就提出五位一体的人口战略的主张,即控制人口总量、提高国民素质、合理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分布和开发人力资源,并认为前 4 者是前提和条件,最后一条才是问题的关键。^[7]但就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能做的主要是控制生育数量和改善生育质量这两个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对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断加以调整;而对其它方面寄予太高的期望是不合实际的。

总之,狭义的人口问题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无论如何都不是首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关键又是制度的继续创新和决策的有效性**问题,是教育和技术的大发展问题,是资源环境的有效开发和合理保护问题。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低生育率的条件下人口问题的焦点也正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随着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异军突起;同时,在知识经济和倡导终身学习的时代,在经

济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在全球性竞争和合作的时代,国民素质问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所以,一个修正的观点也许可以这样表达:人口数量问题依然是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众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最基本的问题,但需我们从均衡的、综合的角度来认识和解决,均衡主要指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均衡,综合主要指数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当前问题和未来问题的统筹兼顾,最终目标是实现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乔晓春主编.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研究文集.人口研究,1999 年专刊
- [2] 穆光宗.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学术季刊(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94(3)
- [3] 穆光宗.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控制.科技导报,1995(3)
- [4] 穆光宗、陈卫.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和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 年 5、6 月号(总 128 期)
- [5] 穆光宗.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看生育率下降的代价问题.开放时代(广州),1997 年 3、4 月号(总 114 期)
- [6] 穆光宗.人口增长问题的渐显性与相对性特征分析.南方人口,1999(1)
- [7] 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5)

(责任编辑 孙立明)

科技动态

电话局的光纤网将来可能使用玻璃光电开关

据英《新科学家》2001 年 4 月 21 日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可以用激光把波导管“烧进”或“写入”玻璃块内,形成传输全部光纤线路的玻璃光电开关。即是说,不久的将来,操纵光信号的光电开关可能用玻璃块取代。

光纤可以同时传输许多路电话及其它数据流。为了在电话局使数据改道,必须分解和处理数据流。因为不是任何电路都可以做这种光学工作,因此必须将信号转换成电脉冲,然后再转换回光信号。哈佛大学的 Chris Schaffer 和 Eric Mazur 认为,他们利用玻璃块内部形成的波导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本周他们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材料研究协会的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发现。

Schaffer 说,如果用很短很短的激光脉冲聚焦在玻璃块内,它就会在玻璃块内积存能量加热该处的材料并将它熔化,激光的每次脉冲可以熔化一个约 10 微米直径的玻璃球。为了把波导管“烧进”玻璃内,只要简单地用激光沿玻璃块扫描就可以熔化出一玻璃圆柱。在圆柱边缘的玻璃首先冷却,形成低密度因而具有低折射率的玻璃,这

就增加了对圆柱中心熔化的玻璃的压力,结果冷却成密度较高因而折射率也较高的玻璃。这种高密度的玻璃就形成了传输光信号的波导管。因此,当移动激光通过玻璃表面时,就在表面下制造出一个波导管,它的直径约 8 微米,这对电话通信是很理想的。当利用一面小型透镜改变激光的焦点时,可以在玻璃块表面下 1 厘米的距离制造出波导管。

研究人员还能在波导管之间制造连接点,这样就在玻璃块内形成完整的光通路。为了试验连接点是否有效,研究人员在玻璃块内制造了交叉的 3 个波导管。当将光线入射到一个波导管时,它能渗透到相交的另外两个波导管中,这样就得到了 3 个输出信号。现在该科研小组正计划制造一个分解不同光波波长的器件,以分离数据流。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光学研究所的 Karen Ness 说:这种神奇的玻璃块有能力将光信号接入不同的通路,这是一大进步,我们正在用这种方法试验生产拥有 96 条或更多光通路的玻璃块。

(刘先曙)

(上接第 60 页)

很紧,于是原来的薄膜就变得更薄。当去掉电压时,薄膜又恢复到原来的厚度,也就是说,薄膜在电压的开关控制下,可以一缩一胀;如果将薄膜卷成管状,就可以用来制造很

微型的分子泵。材料专家们说,如果将“悬挂”液晶分子的聚硅氧烷材料制成块状,其用途可能更广泛。

(刘先曙)